

书品

SHUPIN

二〇一一年·第三辑

- | | |
|------|-----------|
| ◎徐 俊 | 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 |
| ◎柴剑虹 | 感念作者和读者 |
| ◎白化文 | 敬读《江湖丛谈》 |
| ◎蒋 寅 | 读《奢华之色》札记 |

中华书局

专题文章

徐 俊 中华书局的良师益

——怀念何兹全先生 3

柴剑虹 感念作者和读者

——为《文史知识》办刊三十周年而作 7

学林往事

散 木 关于线装本《骆宾王文集》的故事

18

评书论学

白化文 敬读《江湖丛谈》

28

蒋 寅 读《奢华之色》札记

30

铁爱花 曾维刚 平常表象背后的历史意蕴

——读《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34

洪茂宁 与绝世风华的灵犀邂逅

——评介《怡情书吧·李清照》

40

马培洁 域外汉籍研究的新视角

——评《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

46

王长民 山东盐业研究的创新之作

——评《明清山东盐业研究》

52

编辑燕谈

秦淑华 三位好朋友

——介绍中华书局新出三本语言学著作 57

读书札记

严晓星 汉简《孙子》“衡师比在陞”初探 59

范子烨 读《陶渊明集》札记 68

郑伟 罗袜何以生尘? 76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21

从点查清史稿谈到重印清史稿 78

商榷篇

赵庶洋 点校本《朝野僉载》匡补 85

孙建权 《金史》正误十则 91

书苑撷英

黄仁宇著 《现代中国的历程》 韦政通著 《韦政通文集》 96

更正 33

《书品》2010 年合订本已出 51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黄松 副主编:冯宝志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电话:(010)6345823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

——怀念何兹全先生

徐俊

何兹全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既深且久：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先生参加《资治通鉴》标点，参加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并担任编委，参加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并担任第一二册主编，“文革”中借调中华书局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一直到2006年六卷本《何兹全文集》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跨越半个多世纪，是中华书局最重要的作者之一。近年我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何兹全先生担任修订工程学术顾问。2009年，中华百年局庆系列活动揭开序幕，何兹全先生与季羨林、任继愈等先生一起接受邀请，担任中华书局学术顾问。何先生多次戏称与我们是“中华同事”，我们中华人更视何先生为良师益友。

标点本《资治通鉴》是新中国组织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史籍整理本，何先生是12位标点者中最后辞世的一位。1954年9月，毛泽东布置吴晗、范文澜标点《资治通鉴》，要求在一两年内出版。同年11月，“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成立，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组建“标点《资治通鉴》小组”。《通鉴》标点小组共12位学者：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郑天挺、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章锡琛。顾颉刚任总校对，王崇武为召集人。王崇武与何先生是北大史学系相差一级的同学，也是解放前史语所的同事。12位学者分工合作，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全部294卷的《通

鉴》于1956年6月出版。其中,何先生承担了《通鉴》卷六三汉建安四年至卷七〇魏太和元年、卷八七晋永嘉三年至卷九五晋成康三年,共17卷的标点,正是何先生长期着力的魏晋史部分。何先生还参与了书中其他部分卷次的覆校,是《通鉴》的主要标点者之一。标点本《通鉴》是现代古籍整理范式的开创性成果,对古代文献整理和古籍出版事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遗憾的是,关于《通鉴》标点,十余位当事人都没有留下记述,在何先生的回忆录《爱国一书生》中也只字未提。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出版后,我曾将其中有关《通鉴》标点的内容复印出来,分别送给何兹全先生和蔡美彪先生,希望能引发他们的回忆,给学术界提供一些关于《通鉴》标点的往事。蔡先生参与了当时的组织工作,撰写了《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书品》2008年第3辑),何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成文。

每次见到何先生,他都会说起在西郊翠微路大院参加“二十四史”点校的往事。在上个世纪持续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参与点校的各地高校学者,曾先后于1963年、1967年、1971年,三次奉调进京集中办公。何先生被借调到中华,就是在1967年。当时集中在中华工作的还有北大、武大、山大等高校的邓广铭、邵循正、许大龄、张政烺、陈乐素、唐长孺、姚薇元、陈仲安、高亨等先生。何先生到中华之前,一直在“劳训队”劳动改造,何先生回忆说:“在中华书局,如在桃花源中避乱。”中华为本地参加标点的先生也配备了铺位,但因为城里有家,何先生每天早晨吃过早点就往中华奔,下午下班回家。中华当时的负责人孙达人在局里正式宣布,凡调到中华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都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革命群众,何先生说:“在中华,我们这堆人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当时何先生主要参与唐长孺先生主持的《魏书》点校。何先生在《爱国一书生》中有一章专门介绍那段时间的情况,除了工作,学者们也参加书局的大批判,批判齐燕铭、金灿然,何先生说自己曾用“战地黄花”的笔名写过大字报。但何先生对金灿然评价很高,

多次跟我们谈他印象中的金灿然，谈脑病后的金灿然，很为他的遭遇惋惜，认为他对文化建设有很大的贡献。

何先生在中华工作时间虽短，但对中华和点校本“二十四史”很有感情。他经常说，我比你们中华还大一岁呢（中华成立于1912年元旦）。2005年，我们开始着手点校本的修订准备，去征求他的意见。何先生表示支持，并与季羨林、任继愈等先生一起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希望中央政府予以关注和支持。2006年4月，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在香山饭店召开，95岁高龄的何先生在会上说：“对中华的修订工作，我很高兴、很赞成，愿意做一个小卒，摇旗呐喊。”

何先生是旧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世的最后一位学者，2009年夏，中华影印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何先生听说后特别欣慰，跟我们讲了很多史语所的人和事，讲在李庄艰苦条件下的研究和生活，老先生很为当时发表在《六同别录》上的三篇论文而得意。何先生一生以史学研究和教学为主，除了参与《通鉴》和“二十四史”点校，对古籍整理很少有专门的涉及，但是他对古籍整理的见解精辟，令我印象深刻。在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上，何先生拿老商务、老中华在古籍出版上的不同作比较，说：“当年，商务有一种‘往前’的精神，出版了《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原样影印的东西；中华则有一种‘往后’的精神，出版了不少标点本、排印本，像《四部备要》。点校本‘二十四史’有标点有分段，方便现代人使用。用发展的眼光看，出版的精神是要向近代化方向走。”何先生概括的两家老社在古籍出版上的差异，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理念和对时代需求的认知。走进新时代的中华一直坚持对古籍文献的深度整理，坚持为学术界提供古籍基本书的出版方向，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读者所用的理念，正是何先生所说的“往后”的精神。

2006年6月由中华出版的六卷本《何兹全文集》，是何先生七十多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在书稿编辑之初，何先生已年过九十，仍亲自编排文稿，校阅排样。到书稿接近排定的2005年，何先生还

经常与郭老师一道打车到地处偏僻的中华送稿。关于《文集》，特别让人感念的是何先生辞退稿酬的佳话。《文集》进入编辑环节之前，中华就与何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按例向何先生支付稿酬。2006年初，何先生主动给责任编辑打电话，要求我们重签出版合同，不要一分稿酬。我们知道后，再次表示我们的心愿，并试图做通何先生的工作，但何先生知道当时中华经济困难，坚决要求放弃稿酬。《文集》付印前，何先生与中华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那是一个世纪老人仁厚宽宏和古道热肠的见证。《文集》出版正逢何先生的96岁生日，我们奉上用绸带包裹的99套《文集》样书，表达中华人一份真诚的祝愿，并与北师大历史学院联合召开了《文集》出版发布会。后来《文集》获得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我们去小红楼看望何先生的时候，奖牌就放在轮椅对面的书桌上，在一旁的护工岳嫂说：爷爷可高兴了，无论自己到哪里，都要看到这个奖牌。去年，《文集》又荣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是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最高荣誉。《何兹全文集》的出版，实现了何先生晚年的心愿，也为中华书局的学术著作出版增添了一份带着浓浓情感的厚重。

（《何兹全文集》，全六册，何兹全著，中华书局2006年7月，280元）

感念作者和读者

——为《文史知识》办刊三十周年而作

柴剑虹

自1987年4月30日中华书局局务会任命我担任《文史知识》编辑室副主任起,至1997年夏我从党校学习归来后离开编辑部,我在《文史知识》编辑部主持编辑工作整整十年。十年编刊120期,还有“文史知识文库”二三十种,与编辑部同仁一道,期间劳顿笔墨,启益心智,甘苦自知。李侃主编和杨牧之、黄克诸君的开创之功,自不消说。昔日诸多编辑同道,合力工作,劳苦功高,而且务实奋发者,均事有所成,业有所进,成为今日出版界之精英、砥柱,亦无庸我在此赘述。本文只是就我的记忆及手边资料,举若干事例,对《文史知识》的广大作者和读者表达诚挚的感念之情。

—

1989年10月17日,中华书局在民革中央会议室举行了庆祝《文史知识》出刊百期的座谈会,除书局领导和杂志编委会成员外,文史界诸多著名学者或慨赐题词墨宝,或亲临会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发言称:“我是《文史知识》的第一读者!”当时我坐在臧老的老朋友季羨林教授身旁,季老小声对我说:“他是在和我争‘第一’呢。”我知道,季老在刚给我们写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很多年以来,我每月都收到大量的杂志。由于数目过多,我真正认真去阅读的,读得很仔细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文史知识》是其中之一。”(《〈文史知识〉百

期祝词》)于是就对季老说:“那您就做我们的第一作者吧。”季老笑而颌首。

其实,季老对《文史知识》的关爱是众所周知的。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书刊报纸的约稿信雪片似的飞向北大东语系或十三公寓,季老应接不暇,只能推辞十之七八;但只要我打电话去请他为《文史知识》写稿,不但痛快允诺,而且往往过两三天就写好文章寄来。例如《说“嚏喷”》、《再说“嚏喷”》、《关于“奈河”的一点补充》、《再谈 cīnī》等文,都是根据我们杂志“大家写小文章”的特点特意撰写的。1988年我们到山东淄博去组“齐文化专号”的稿件,季老知道我们的选题计划后,深表赞成,马上寄来《祝贺〈文史知识·齐文化专号〉》一文,热情地肯定:注重探讨地区文化“这是高明之举,这是目光远大之举”。1989年7月,《文史知识》出刊百期,季老在《〈文史知识〉百期祝词》里概括他对刊物的印象是“严肃、庄重、典雅、生动”,同时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可以适当刊登一些世界其他国家讲中国文史的文章或者研究动态”的建议,促使了刊物栏目的改进。除了加强原有“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栏目的组稿外,后来又专门约稿连载了“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系列文章。

1997年11月,我已离开编辑部,季老听说书局新来的领导对我们编辑部的工作颇有大刀阔斧“改革”之意,就寄给我一封短信,祝贺《文史知识》出版二百期,全文如下:

《文史知识》是我最爱读的学术刊物之一。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我想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严谨而又清新活泼,学术性强而又具有令人爱不释手的可读性。这种风格来之不易,是《文史知识》全体同仁经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形成的。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样的刊物是必不可少的。

祝《文史知识》永葆青春!

1997. 11. 14

推许与担忧之意,均流于笔端。因此,说季老是《文史知识》的第一作者或第一读者都是理由充足的。

臧老的话同样真实可信。臧老的写作任务与社会活动也非常繁重,但他对《文史知识》的关切同样令人感动。他曾给我写过七八封信,兹先引述 1989 年 7 月三封信的内容如下:

剑虹同志:

来电话,约写小文,当奉命。

六月号《文史知识》至今未见到,或因动乱丢失,请查一下,补我一期。昨天在《北京晚报》上,吴小如同志写了短文,批评《古代抒情散文鉴赏集》中对他的《送董邵南序》一文的注释错误处。此书《开浩荡之奇言》一文中(第八页倒数十四行)“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第一个“圣人”之“圣”字,恐系“至”字之误。特奉告。

好!

克家 89.7.10 日上午

剑虹同志:

你要我写五百字,如数奉上。

我为人性子急,答应了事情,赶快办完,了却而后心安。还有一篇《大学生文选》的序言,在等我动笔。

握手!

克家 89.7.11 日午

剑虹同志:

寄上一函,又送上小文,想均已入目。

记忆有误,“一百期”误为“创刊十年”,请改正。

前函请寄六月号《文史知识》一本(补寄),因六月号至今未收到,也许动乱时期寄丢失了。

再,请将你的电话号码在电话上告知,以便有事联系。前

几天,在会场上遇到牧之同志。前天,我爱人郑曼同志在会场(听报告)上碰到李侃同志。

好!

克家 89.7.17

一周内连写三信,可见他对我们刊物的关切。他寄来的“小文”题为《第一号朋友》,文中说:“我这样自许:在全国读者群中,我算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了。”10月17日,为《文史知识》“出满百期”,臧老又寄来一首七言诗《我的祝贺》:

乐莫乐兮旧相知,创刊一直到百期。

感谢益我“友多闻”,每次捧读神不疲。

1989年10月11日,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社社长林庆彰、总编傅武光等一行7人来中华书局访问,商谈进一步加强合作事宜。一年前,李侃总编希望我以《文史知识》副主编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双重身份和台湾同行商讨交流合作事宜,双方坦诚商议,很快便达成了在组稿、转载、转让“文史知识文库”版权等方面的具体意向。《国文天地》社和他们的万卷楼图书公司不仅购买了“文史知识文库”中一批书的版权,而且在我们的协助下陆续转载或约写了大陆作者的许多文章,还冒着“违反当时台湾法规”的风险,购买了一大批大陆的出版物,在台湾图书业界引起轰动。《光明日报》还在1989年3月29日发表了相关的报道。这次来访,一个重要议题是,双方着手共同编辑“台湾专号”,在海峡两岸同时推出。于是,我们特地向新闻出版署打了请示报告。经过努力,1990年4月和5月,该专号分上、下两期和台湾《国文天地》同时出版,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台湾的《联合报》、《自由时报》等都为此发布了消息,两岸文史界与广大读者也都给予了好评。臧老对此也尤为兴奋,深表支持,他在1990年7月12日给我的信中明确表示:他编的书“如果台湾《国文天地》愿在台湾出版,我同意。别人写的关于我作品的欣赏集台湾也出版了。”又特别提及“台湾

作家墨人先生及其他那位中年作家都来访谈过，他们态度亲切，很谈得来”。在促进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上，由一些著名老专家打头阵，我们的作者功莫大焉。

我们与《国文天地》的成功合作，引起了台湾其他出版社极大的兴趣，纷纷来大陆探求合作机缘。台湾文津出版社是邱镇京教授为推进文史学术研究而创办的。他来中华书局接洽引进《五灯会元》的版权，因他早年写过研究敦煌变文的论著，我写过介绍文章，于是找我帮忙。我考虑当时大陆有许多比较优秀的文史类博士论文得不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就建议他出版“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他不顾资金困难，欣然同意。于是，开始由我帮助推荐了数十篇大陆各高校的博士论文，后来陆续出版至一百多种，蔚然瞩目。这些博士论文的作者，后来大多成为我国有影响力的文史研究专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应该是书刊出版“走出去”的先行者。

我们的许多作者都堪称文史大家，不仅热心为《文史知识》撰写“小文章”，而且即便是行家里手“烹小鲜”，仍是谦虚谨慎，一丝不苟。我相信编辑部的同仁都有过为大名家改稿子的经历，从中得到的教益则是多方面的。我这里还保存着一封著名历史学家刘乃和先生 1990 年 9 月 24 日写给我的信，信的前半部分：

剑虹同志：

前寄三国稿，想已收阅。

我发现其中有一处抄错，即第三页第五行所改添之字中，“而明《广兴志》已收入”，其中“兴”字是“舆”字之误。请改过。

如不能用此稿，则作罢。

还有一事也值得一提：1996 年 9 月，有一位年轻学者寄来一篇文章，提出某个与李学勤先生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有道理，为慎重起见，寄给李先生征求意见。当时李先生出国了，回来见到信及文章，很快回信给我：

柴剑虹先生：

您九月寄来大函及一篇文稿，当时我不在国内，因而压在信件中，未能早覆，极为歉疚，敬祈鉴谅！

此文很有意思，足备一说，建议予以发表。现呈回备用，请查收。今后仍望多指教。顺祝

新春康泰

李学勤 上

一月廿七日

谦谦君子之心，跃然纸上！

季镇淮教授是研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大专家，“文革”后曾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我们刊物的常年读者，他1986年离休后，我们曾去他家探望。他晚年因养病难得撰文，编辑部也没敢催促约稿。1990年5月16日，他寄来一篇文章，所附信函内容如下：

寄上拙稿《文学家的张衡》一篇，请审视。此稿成于87年下半年，因病未能早日请教，不无遗憾。多年蒙赠阅《文史知识》，如永无奉献，何以说得过去。不过水平差些，仍祈见谅。

谨此，即颂

撰安

季镇淮 拜上

我想，无论谁读了这封饱含真情的信，都会为之动容的。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宣传敦煌文化，编辑部决定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研究院合办一期“敦煌文化专号”。1988年初夏，我和编辑部冯宝志、华晓林、余喆、马欣来等同志一道到敦煌，一面参观学习，一面与研究院的各位作者商议稿件的修改加工。当时，段文杰院长不仅亲自安排樊锦诗副院长带领我们参观并讲解洞窟，而且带头撰写文章，他一人就为这期专号贡献了三篇文章。据说老专

家史苇湘先生是很有性格的，一般不愿意别人修改他的文章，可是却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几次对我说：“我就喜欢你们对我的文章提意见，一道来好好修改！”段院长还毅然决定该期专号加印两万册，由研究院包销，以扩大影响。为编好这期专号，我在1988年2月致函香港的饶宗颐 and 台湾的潘重规两位前辈，饶公即于3月1日回信给我，称道“先生主编《文史知识》嘉惠学林，发扬敦煌学甚盛事也”，“谨将迩日札记短文一篇奉上，未知可用否”？1997年春，我和黄松、王亚君同志为编辑出版“潮汕文化专号”事去汕头、潮州商谈，参观了落成不久的“饶宗颐学术馆”。杜经国先生请我回京后帮助饶公影印北图所藏《康熙潮州志》。影印完成后，我去信向饶公报告此事。饶公即于3月14日来函云：

手教欣悉。文驾趋临潮州，至小馆参观，忻忭无已。《文史知识》“潮州文化专号”闻说需要小引一篇，兹寄上。拙稿已另印一份送杜经国兄。《康熙潮志》得兄代影巨册以感。

正是有这些文史界老前辈做榜样，不仅我们的编辑深受教育，也对许多有志于文史研究及文化知识普及的中青年作者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正是办好刊物的根本保证。

二

启功先生曾经多次对我讲：“过去讲出版社是作者的‘衣食父母’，其实，真正的衣食父母是读者。”《文史知识》三十年的历程，证实了启先生的话诚为至理名言。我们刊物的读者成千上万，给编辑部写信、打电话的几乎每日不断，但仍是少数；我在编辑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就是给读者写回信，那时没有电脑可用，十年之中，大约用笔写的信也至少有上千封，当然仍只占极小的比例。前些日子南方有位熟识的教授打电话来，说看到某旧书网上在拍卖我写的信，是用《文史知识》的信纸所写。我笑着回答：“这样的信

我写得很多,恐怕是不值得去买的啊!”这里只回忆几个比较特别的故事。

在当代最负盛名的学术大师中,没有成为《文史知识》作者的,恐怕就是钱锺书先生了,但他仍然与《文史知识》有缘。1989年第5期的《文史知识》上,刊登了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博士内山精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一文,钱先生听说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希望能看看这篇文章。经约定,我就拿了刊物送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请教机会。因为还未及看那篇文章,钱先生的谈话并未涉及《宋诗选注》的相关内容,只是对此文为何发表在《文史知识》上很感兴趣,我讲因为编辑部有一位复旦毕业的同志,所以得以组稿的便利。我乘机向钱先生约稿,钱先生很客气而坚决地说:“我已经不给任何一家杂志写文章了,就不好破例了。”我转而向杨绛先生求稿,杨先生则笑眯眯地说:“我一个老太婆更写不出来了。”钱先生补充说:“不过,你们的杂志我还是很愿意拜读的。”我记得钱先生谈及对国内文史类刊物的印象时,还是很看重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的。钱先生还问我写些什么文章,我讲进中华书局后开始涉足敦煌文学写卷的研究,正在写一篇关于《黄仕强传》的文章。我曾看到钱先生《管锥编》中谈到过一个日本藏的《黄仕强传》敦煌写本,正好趁机向钱先生讨教。那次我在钱先生家坐了四十分钟,亲身感受到了他的大家风范。之后,我又和钱先生通过几次电话。1990年,正逢钱先生八十华诞,他几乎推辞了一切祝寿活动。我希望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他不同意。恰好台湾《国文天地》1990年的1月号上登了苏州大学季进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代宗师钱锺书》,我便以两岸学术交流为由,希望钱先生同意在《文史知识》上转载此文。他在电话中说:“我上次要给你写信,因手痛没有写成,算是欠了你一封信,只好同意你登这篇文章了;但是我也得走你一个‘后门’,请您代劳将诸如‘一代宗师’这样的不实之词统统删掉!”我当然遵命,文章的题目也改成了《淡泊自守

的学者钱锺书》，钱先生没有再提出异议。

《文史知识》的另一位特殊的读者是著名作家李准。有一天，同在王府井大街 36 号楼办公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女士到五楼来找我，说李准同志希望找一些《文史知识》读，因为他在家养病，不便到编辑部来。我便请那位女士带了若干本杂志给李准同志。过了些日子，她又带话来说李准希望和我聊聊，我就又带了些杂志去登门拜访。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高产作家、剧作家的住房条件并不好，但是并未影响他写作与读书的热情。他讲大病初愈，更愿意多看些书刊，而《文史知识》杂志讲求知识准确，文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许多又出自专家手笔，他很喜欢看。他建议能否创造条件，将来办《文史知识》的农村版，因为广大农民同样需要提高文史修养。李准同志一生写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关注农民文化生活、文化修养，是他想得最多的问题。他的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办农村版的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尤其是 1989 年下半年后，在《文史知识》大学中订户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向农村发展不失为一个好设想，可惜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想法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其实，我们刊物自创办始，就有一批忠实的农村读者。我曾经接到几位农村读者的信，他们从《文史知识》创刊号起，便一期不漏地订阅。偶尔哪一期丢失了，便马上会来信、来电补购。我记得有一位家住无锡华庄镇崔巷的陆正明同志，曾多次给李侃和我来信求购刊物或图书。1996 年，他订阅的第 6 期被邮局遗失，在 9 月份寄信李侃先生，并寄了 4 元钱要求补购；后来又给周振甫先生写信，请求帮助查询。周先生写信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位农村的老先生，在《文史知识》创刊十周年之际，特地用毛笔写了诗歌寄来表示祝贺。杂志办“我与《文史知识》”的征文比赛，许多农村的中小学教师热情参与，有的还获了奖。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些旅居海外的华人也是《文史知识》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1989年3月初,李侃主编交给我一篇文章,是住在加拿大的一位老先生的投稿,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梅益先生(1913~2003)转来,让我答复梅益先生。我于3月11日给梅先生写了信,20日即收到梅益先生的回信。全信如下:

柴剑虹先生:

昨收到十一日来函,承蒙关怀,十分感谢。

戴先生现住加拿大,文章是他从加拿大寄给他住在新加坡的友人的。他的友人是我中学同学,文章是我同学寄给我的。自从李侃同志函告戴先生文章将在《文史知识》发表后,我曾将这一消息告诉我的同学,可是至今迄未收到他的回音,不晓得是他留的地址有误或是其他原因。我正在向我一些同学打听中。贵社寄给戴先生的刊物等可先寄给我,由我转送。麻烦您了,再次感谢。

梅益 十九日

梅益先生是我国新闻战线的老前辈,时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总编辑。从他的来信中不难看出他和一些海外老人对《文史知识》的重视。

从1996年第1期起,我们杂志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专栏。促成此事的正是当时在日本京都地区主编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刊物《岚山》的蔡毅先生。他不仅自己带头撰写稿件,而且成功地向日本一些著名的中国学家(如清水茂、竺沙雅章、中岛隆藏等)组稿。该系列文章一直刊登到1998年11月,不但拓展了学界的视野,也壮大了我们的海外作者和读者队伍。

《文史知识》的作者和读者还有许多丰富、生动的事迹可写,限于篇幅和记忆,前面所写实不及万一。往昔为刊物撰写“治学之道”文章的老一辈学者,许多已驾鹤西行,却通过我们的刊物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当年辛勤耕耘“青年园地”的众